

内生动力视角下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农户收入效应

张笑寒,陈毓雯

(南京审计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发展为农户解决了许多外部困难,但在整体增收难的背景下,部分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的内生性困境也逐渐暴露。基于内生动力视角,利用江苏省南京市262户资金互助合作社入社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构建OLS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验证了资金互助合作社对于入社农户家庭收入的效应。研究表明:内生动力对入社农户的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高收入农户的增收效果优于低收入农户,家庭劳动力占比、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社会地位、贷款难易程度等对入社农户收入也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应当积极培育农户的内生动力,发挥农户自身的主导作用,帮助培育社会资本,完善低收入农户增收机制,优化农村社会信用环境,进而构建“内外兼修”的农户增收机制。

[关键词]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内生动力;收入效应;分位数回归模型;农民收入;农村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20)06-0088-07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近年来,各地区都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三农”对资金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但农村金融供给的缺口不断扩大,因此在相关农村金融制度政策的指引下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下文简称“资金互助合作社”)应运而生,它凭借信息、效率、成本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农民融资难题,也为农村金融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2005年起江苏省开始推进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试点工作,作为新生事物,这些年来全省各县市的资金互助合作社经历了野蛮生长式的高速增长阶段,也经历了风险频发并引发一定范围内金融风险的行业低谷阶段,目前正从快速发展向规范发展转变。截至2017年,江苏省经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的资金互助合作社共计336家,资产总规模102.31亿元,成员总数43.19万户,投放互助金73.86亿元,社均规模3045.08万元,社均杠杆率593.14%^①。随着城乡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民收入虽然总体呈增长态势,但城乡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因此促进农民增收、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然是我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金融供给的空白,缓解了农户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需求,对带动农户增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重要的意义。因此,研究资金互助合作社对农户的增收效应,探寻未来资金互助合作社发展的新路径,是消除农村金融供需矛盾、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户增收的重要课题。

在已有研究中,许多学者研究了资金互助合作社的意义、现状、模式和效率等。罗荷花与李明贤提出资金互助合作社凭借其独特优势将会是中国农村金融组织创新的突破口^[1];张德元与张亚军集中归纳了中国现存的各种典型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模式,指出只有互助才能实现农民专业组织的长期可持续发展^[2];潘军昌等分析了资产规模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经营绩效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3];林乐芬等运用DEA方法评估了江苏省资金互助合作社的经营绩效,并提出其转正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4]。还有一些学者着重关注了资金互助合作社在实践运行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卢敏等用实际案例分析了内生型资金互助合作社存在的原因、运行机制以及面临的困境,肯定了互助社与股权信贷机制的积极作用,但也提出该机制存在的局限^[5];张笑寒等基于层次分析法测算了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融资能力,发现资金互助合作社综合融资能力整体较弱,进而影响到了合作社对当地的经济带动能力^[6];张林以及冉光和分析了资金互助对社员农户信贷行为的

[收稿日期]2020-04-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GL126)

[作者简介]张笑寒(1968—),女,江苏通州人,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农业经济与土地制度研究,E-mail:zxh@nau.edu.cn;陈毓雯(1995—),女,江苏盐城人,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

^①谈建平.江苏农民资金互助社转籍探索前行[N].农村金融时报,2018-09-17(A3).<http://epaper.zhgnj.com/Html/2018-09-17/29852.html>.

影响,发现社员的信贷可得性不高,面临的问题也日益增多^[7]。针对现实中的问题和不足,学者们纷纷提出了各种建议,孙同全提出“双层+双线+委托”的监管体制有可能解决农民资金互助监管过度和监管缺失并存的窘境^[8];朱乾宇等运用博弈方法发现强外部约束可以有效避免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出现发起人控制现象^[9];杨智玲等通过演化博弈分析了资金互助合作社在有政府监管与无政府监管的两种情形下其自律行为的演化规律及稳定策略,论证了政府监管的必要性^[10];赵锦春和包宗顺运用 134 家苏北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调研数据,发现互助金规模提高会提升合作社运行稳健性,因此建议适度规模经营、限制发起人的股金比重以及禁止贷款非农化使用^[11]。这些观点和建议为今后进一步规范发展资金互助合作社提供了一定的启发。

现有的文献成果尽管十分丰富,观点纷呈,但是研究视角较分散,深度也有待进一步的挖掘。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初衷是解决农户资金需求问题,助农增收是其最终目的之一,但是多数学者侧重于表达资金互助可以促进农民增收这一结果。如黄平以福建省连城县旺万家养殖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为例,发现其通过开展资金互助试点工作促进了农民增收^[12];王慧芸与王刚贞对资金互助与精准扶贫的耦合协调性进行了研究,发现两者处于低耦合状态,在助农增收和精准脱贫方面的成效有待提高^[13]。至今专门研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与农户收入效应的文献很少,实证分析则更缺乏。吴忠等发现资金互助能够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但部分农户的主动性不高的内生性困境也逐渐显露,因此如何激发农户的内生动力对于提高农民收入至关重要^[14],遗憾的是其研究缺乏实证检验,但他的观点启发了我们,从内生动力视角来研究资金互助合作社对于农户的收入效应,或许有助于我们找到一条解决资金互助合作社如何促进农户增收问题的可行之路。其实,已有学者从内生动力视角来研究贫困农户的扶贫效应,徐志明认为内生动力对于贫困户提高扶贫投资效率有重要作用,只有农户自身的力量才是其致富的根据^[15];管睿等将内生动力纳入可持续生计框架后发现,内生动力能够有效提高贫困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16]。那么,内生动力对于参与资金合作社的农户家庭收入是否有影响?且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入社农户而言其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问题尚待我们深入探究,且需要运用实际数据加以检验。基于此,本文将从内生动力视角,从理论上推导资金互助合作社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路径,运用江苏省南京市入社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构建 OLS 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验证资金合作社的农户收入效应;并将样本农户分为低、中低、中等、中高、高五种不同收入水平,以进一步检验农户入社的收入效应差异,探究内生动力、合作社发展与贫困农户增收减贫之间的联系,为农民资金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和增强农户增收能力提供一定参考。

二、理论分析

2017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中提出“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摆脱贫困内生动力”,此后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也频繁强调要“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但是,目前学界对于“内生动力”尚未有一致界定,傅安国等在其研究中提到中国扶贫情境中的“内生动力”是在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自我奋斗实现脱贫的倾向,包含自我观、核心价值观和脱贫行为倾向等三方面因素^[17];管睿等将内生动力细分为风险偏好、抱负水平及自控能力三方面,并运用农户数据实证分析了内生动力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16]。结合他人研究和参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农户特点,本文将从风险偏好、认知程度及抱负水平三方面来测度入社农户的内生动力,其中风险偏好是指农户挖掘开发自身的资源禀赋能力以及寻求外部发展机会的渴望程度,认知程度是农户对外界各种信息的认识、判断与处理能力,抱负水平衡量农户是否存在消极的思想以及寻求自主发展的意愿强度。这些内生动力将分别通过经营决策、拓展能力和生产动力三大传导机制而对入社农户的收入产生影响,影响路径如图 1 所示。

(一) 风险偏好影响农户经营决策

农户作为独立的经济行为主体,他们的行为受到利益驱动、自身能力、所处环境的制约。风险偏好直接影响入社农户的生产经营决策,当下的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在面临高市场风险时候,低风险偏好的农户一般持风险回避的态度,导致其收入难有明显增长,高风险偏好的农户偏向冒险经营从而获得高回报^[18]。此外,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风险偏好存在差异,高收入的农户在面临风险时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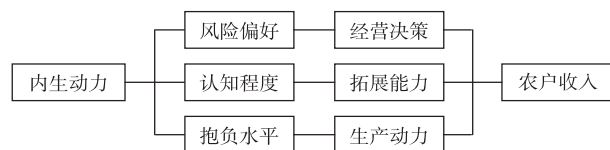


图 1 内生动力对入社农户的收入影响路径

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通过转换资产可以降低风险,在化“危机”为“转机”的过程中提高收入,而低收入农户由于资产有限难以使用现代农业科技和手段,更没有能力承担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在生产经营决策时较为保守,不敢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实现增收相对困难,由此也导致现实中容易产生互助合作社贷款资金的“精英俘获”现象^[19]。可见农户的风险偏好影响其生产经营决策,且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1。

假说 1: 风险偏好正向影响入社农户的收入,且对高收入农户的增收效果优于低收入农户。

(二) 认知程度影响农户拓展能力

农户的认知程度反映了其接受、分析和应用各种信息的能力,一般农户的认知程度与其受教育程度、年龄、社会地位、生活经验等相关,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又影响农户自身获取收入的能力,认知程度高的农户思想灵活,对外界各种信息十分敏感,善于捕捉有益信息,通过不断拓宽致富路径而实现收入增长。尤其是对于高收入农户,他们在从事农业的同时往往利用多余资金做一些其他投资或者创业,如在当前农村电商迅速发展、物流体系不断完善的背景下,高收入的农户利用网络平台销售农产品,既扩大了产品销路,又拓宽了创业渠道,增加了家庭收入。而低收入农户即使认知程度高,但由于缺乏运营资本,没有实力进行投资与创业,只能在农闲时到企业打工或做些兼职,收入也较有限。可见农户的认知程度影响其就业拓展能力,并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收入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2。

假说 2: 认知程度正向影响入社农户的收入,且对高收入农户的增收效果优于低收入农户。

(三) 抱负水平影响农户生产动力

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背景下,农户增收应当顺应时代要求调整农业结构,发展高效农业,而这与其自身综合素质密切相关。高抱负水平的农户有着极强的自主发展意愿,他们不会有“等靠要”的思想,而是通过接受教育培训等途径来提高自身生产技术和业务能力,从而提升自身的收入水平。农民是农村发展的主体,只有激发其内在的生产动力与活力,才能放大各级政府及资金互助合作社提供的各类外在资源利用效率,进而带来农户的收入增长。在此过程中,一般高收入农户的积极性比低收入农户高,高抱负水平从心理层面给了高收入农户积极的暗示,对他们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而低收入农户往往缺乏内在激励与发展基础,即使抱负水平高也难以弥补其他因素给他们造成的限制。所以如果低收入农户自身抱负水平低,缺少生产经营的动力和活力,社会外界再怎么帮扶也难助其彻底脱离贫困。可见农户的抱负水平通过影响其生产动力进而对收入产生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3。

假说 3: 抱负水平正向影响入社农户的收入,且对高收入农户的增收效果优于低收入农户。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9 年 6 月至 8 月在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六合区、江北新区等地的调研。2009 年 6 月 18 日南京市成立了首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高淳县淳溪镇杨家村渔网资金专业合作社,十多年来各区(县)合作社的数量及规模发展相对平稳。截至 2018 年底,全市经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共 33 家,资产总规模约 135000 万元,入社成员数 26000 人。课题组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了浦口区的永宁、汤泉、江浦、星甸,六合区的马鞍、冶山、雄州、龙池与江北新区的顶山、盘城、葛塘、长芦等 12 个乡镇(街道)。在每个乡镇(街道)随机抽取 20~30 户入社农户,然后使用调查问卷及面对面访谈的方式对数据进行收集。由于本文重点关注内生动力对已经参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因此调研对象为已经入社的农户,剔除无效样本后共得到 262 个有效样本。样本分布见表 1。

(二) 变量选择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农户家庭收入

本文选取参与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农户家庭年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包括农户全年各种产品收入、营业收入、

表 1 样本区域和农户分布情况

区(县、市)	乡镇(街道)	样本农户(户)
南京市浦口区	永宁	23
	汤泉	28
	江浦	23
	星甸	24
南京市六合区	马鞍	20
	冶山	21
	雄州	17
	龙池	20
南京市江北新区	顶山	18
	盘城	22
	葛塘	21
	长芦	25
合计		262

打工收入等。图2是农户家庭年收入分布情况的直方图,由图可见农户家庭年收入呈明显的右偏态分布趋势。考虑到收入分布的偏态性以及为验证各变量对高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效果是否比对低收入农户更显著,本文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且参考何军的做法^[20],选择了10%、25%、50%、75%、90%这五个分位点进行分位数回归,并将样本农户分为低、中低、中等、中高、高五种收入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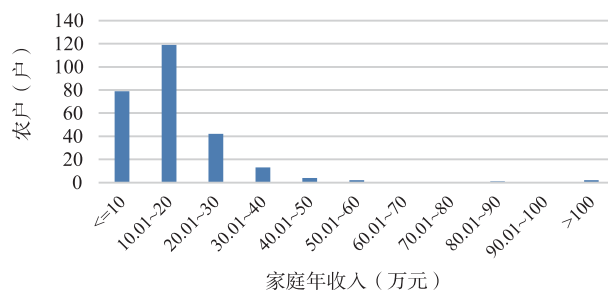


图2 农户家庭年收入分布直方图

2. 核心解释变量:内生动力

本文从风险偏好、认知程度及抱负水平三方面衡量入社农户内生动力的高低,借鉴其他学者的做法^[16],具体设计了三个问题,分别为“您认为您的风险偏好处于1~5哪个等级”“您认为您的认知程度处于1~5哪个等级”“您认为您的抱负水平处于1~5哪个等级”三个问题,从1~5代表着程度递增(表2)。

表2 变量选择及其统计性描述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指标说明	均值	标准误	
被解释变量	农户家庭收入	农户家庭年收入(万元)	16.119	14.861	
解释变量	内生动力	风险偏好	1~5,正向指标	3.007	0.953
		认知程度	1~5,正向指标	3.312	1.146
		抱负水平	1~5,正向指标	3.111	1.115
控制变量	家庭特征	年龄	户主年龄(岁)	51.801	15.943
		家庭劳动力占比	农业劳动力数量/家庭总人口	0.705	0.228
	物质特征	承包土地面积	家庭承包土地面积(亩)	15.157	14.688
		住房价值	住房总价值(万元)	42.000	30.047
		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	农机、农器、农用车等价值在50元以上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总值(万元)	0.777	3.654
	金融特征	贷款难易程度	1~5,非常容易~非常难	3.641	1.149
	社会特征	社会地位	家庭中是否有村干部,0=无,1=有	0.103	0.304

3. 控制变量

(1)家庭特征:包括年龄、家庭劳动力占比。在考虑劳动力数量这一影响因素时,由于不同家庭之间规模存在差别,本文采用的家庭劳动力占比指标是用农业劳动力数量比家庭总人口数。

(2)物质特征:包括承包土地面积、住房价值、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

(3)金融特征:包括贷款难易程度,问卷中具体体现为“您在金融机构贷款难吗? 1~5表示非常容易-非常难”。

(4)社会特征:包括社会地位,问卷中具体体现为“您的家庭主要成员是否或曾经担任过村干部(0=无,1=有)”。

(三)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回归(OLS)和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研究内生动力对于入社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由于最小二乘回归在传统线性回归中容易出现结果不稳健的问题,且过程较为繁琐,而分位数回归^[21]可以有效地避免这一问题,因此本文运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分析内生动力对于整体样本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内生动力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效应。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Y_i = \beta_0 + \beta_1 M_i + \beta_2 X_i + \varepsilon \tag{1}$$

式中, Y_i 表示农户家庭收入, M_i 代表核心解释变量, X_i 代表控制变量。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通过Stata15分析软件,采用OLS和分位数回归对(1)式模型进行估计。为了避免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导致的结果误差,本文先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一般VIF>10时自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关系,检验结果中VIF最高为1.12,均值为1.06,可知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关系,因此回归结果较为可靠。

由表3可知,资金互助合作社农户的收入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并非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中显示的那样单一,而是在不同收入水平上有不同的影响。从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来看,风险偏好、认知程度、抱负水平三者均对入社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系数分别为2.861、2.664、3.557,即风

险偏好、认知程度、抱负水平每提高 1%，入社农户的收入将平均增加 2.861%、2.664%、3.557%，这也与前文的假说相符。另外，内生动力对入社农户的各分位点收入也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比较各分位点上内生动力系数可知，内生动力对于农户的收入影响逐渐增强，即随着收入提高内生动力促进农户增收的效果增强，因此应当重视且利用好农户内生动力这一影响因素，尤其是努力提升低收入入社农户的内生动力，否则将不利于缩小农户间收入差距，反而扩大了农村内部的贫富差距。

具体来看，资金合作社农户的收入水平随着风险偏好、认知程度、抱负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当 10% 的低收入农户风险偏好提高 1%，其家庭年收入将平均增加 0.444%，当 90% 高收入农户风险偏好提高 1%，其家庭年收入将平均增加 2.611%，也就是说同时提高 1% 风险偏好，高收入农户平均增加的收入比低收入农户高出 2.167%，这与前文假说 1 相符。入社农户收入随着认知程度的变化趋势与风险偏好类似，当 10% 的低收入农户认知程度增加 1%，其收入平均增加 1.123%，而当 90% 高收入农户认知程度增加 1%，收入将平均增加 3.717%，即认知程度同时增加 1%，高收入农户平均增加的收入比低收入农户高出 2.594%，这与前文假说 2 相符。入社农户收入随着抱负水平的变化趋势与前两者类似，当 10% 的低收入农户抱负水平增加 1%，收入将平均增加 1.727%，而当 90% 高收入农户抱负水平增加 1%，收入平均增加 4.615%，即抱负水平同时增加 1%，高收入农户平均增加的收入比低收入农户高出 2.888%，这与前文假说 3 相符。

表 3 内生动力及其他因素对农户收入影响实证结果

变量类型	解释变量	(1) OLS	(2) q10QR	(3) q25QR	(4) q50QR	(5) q75QR	(6) q90QR
内生动力	风险偏好	2.861*** (0.000)	0.444 (0.365)	1.258*** (0.007)	2.246*** (0.002)	2.689** (0.012)	2.611 (0.338)
	认知程度	2.664*** (0.000)	1.123*** (0.005)	1.664*** (0.000)	1.974*** (0.000)	4.046*** (0.000)	3.717*** (0.000)
	抱负水平	3.557*** (0.000)	1.727*** (0.000)	1.255*** (0.002)	1.876*** (0.000)	2.642*** (0.003)	4.615*** (0.000)
家庭特征	年龄	0.025 (0.603)	-0.016 (0.554)	-0.001 (0.968)	-0.007 (0.855)	0.004 (0.937)	-0.037 (0.531)
	家庭劳动力占比	2.620 (0.413)	4.061** (0.039)	4.493** (0.041)	3.864* (0.091)	4.481 (0.223)	-0.117 (0.978)
物质特征	承包土地面积	-0.003 (0.955)	-0.015 (0.522)	-0.004 (0.842)	0.018 (0.501)	0.067 (0.221)	0.022 (0.709)
	住房价值	0.036 (0.145)	-0.011 (0.298)	-0.017 (0.166)	-0.023 (0.108)	-0.012 (0.528)	0.000 (0.992)
	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	0.299 (0.144)	0.330 (0.269)	0.247 (0.641)	0.124 (0.804)	0.900** (0.027)	0.194 (0.574)
金融特征	贷款难易程度	-3.752*** (0.000)	-1.311*** (0.000)	-1.721*** (0.001)	-2.473*** (0.000)	-2.243** (0.027)	-3.861** (0.028)
社会特征	社会地位	6.072** (0.013)	0.778 (0.674)	2.075 (0.388)	1.623 (0.198)	2.707 (0.539)	7.298 (0.761)
	样本量	262	262	262	262	262	262
	R-squared	0.3637	0.2032	0.1804	0.2138	0.2848	0.3296
	Prob > F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综上所述，内生动力对农户家庭年收入的回报率会随着他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即高收入农户对内生动力的利用率高于低收入农户，因此容易产生“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马太效应”，意味着社会环境不利于低收入农户的脱贫致富，也影响到农村内部贫富差距的缩小。相对于高收入者，多数低收入农户以及贫困户的风险偏好小，认知程度低，抱负水平低，缺乏足够的内生动力，但低收入农户却是实现全面脱贫的重点对象，因此我们应当更加关注和重视参与资金互助合作社的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

从家庭特征来看，年龄对资金互助合作社入社农户的收入并无显著影响，家庭劳动力占比这一变量在最小二乘法下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但对低、中低、中等收入农户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影响，可见对于中低收入水平入社农户而言，资源匮乏使他们对劳动力更加依赖，为了保证日常的农业生产，家庭中大部分劳动力无法外出打工，最终只能以低效率的劳动力投入来弥补技术与资本上的不足，所以这种类型农户的家庭劳动力占比越大，代表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人数越多，收入效应越显著；而对于中高收入农户而言，他们可以选择以资本或者机器等替代劳动力，因此家庭劳动力占比对他们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物质特征来看，承包土地面积、住房价值对资金互助合作社农户的收入并无显著影响，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在最小二乘回归模型中不显著，但在 75% 分位点通过了 5% 显著性水平的影响，可见 75% 分位点的入社农户对固定资产的依赖性高于其他收入水平的农户，高收入农户可用资金来弥补资产不足带来的不良影响，但低收入农户缺乏这种能力，因此，生产性固定资产对入社农户收入的影响在中高收入层次表现明显。

从金融特征来看，贷款难易程度在 OLS 回归与分位数回归中均呈显著的反向影响，且随着分位点的提高，系数的绝对值呈上升态势，表明贷款越难则入社农户的增收越不易，可见货币资金对于农户增收具有重要影响。

究其原因,参与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农户若缺乏金融资本,便难于进行利润较高的风险投资,尤其是高收入农户对资金的依赖性更大,资金缺乏使其经营决策受到限制,进而影响增收。

从社会特征来看,社会地位这一变量在 OLS 回归中通过了 5% 显著性水平检验的正向影响,但在分位数回归模型中并不显著,说明大多数农户社会地位越高(在本文中表现为家庭中有成员做过村干部)越有助于提高其家庭收入。因为家庭中有人做过村干部一定程度上侧面反映了其知识教育水平较高,同时积累的人脉资源也较多,农户能够做出有利于获得高利润的生产经营决策,所以社会地位这一变量会对入社农户的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与他们本身处于哪个层次的收入水平并无太大关系。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六合区、江北新区三地 262 户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从内生动力视角实证分析了参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验证不同收入水平下内生动力对入社农户的收入效应。主要结论包括:内生动力对于参与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农户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内生动力对高收入农户的增收效果优于低收入农户。家庭劳动力占比对中低收入农户的收入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对中高收入农户的收入产生较显著正向影响,社会地位高的农户增收效果更显著,贷款难易程度对于各收入层次的农户收入均有显著反向影响,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影响力不断增强。因此,要想打破资金互助合作社入社农户的增收瓶颈,不仅要给予农户一定的外部资源与力量支持,还要从农户自身寻找原因,努力培育农户尤其是低收入农户的内生动力,构建“内外兼修”的农户增收机制。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充分发挥农户自身的主导作用。地方政府和基层村(社)应当关注参与资金互助合作社农户自身需求和权利,了解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有针对性地积极培育入社农户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其生产动力、活力以及主导作用。改变风险偏好较低农户的保守观念,创造学习交流平台给认知程度低的农户有机会提升技能与知识水平,提高他们对相关政策的接受程度,给抱负水平低的农户以更多的激励,加强农户自主增收的意识培养,通过激励、扶持等多种手段提高入社农户的自主性,让农户在市场竞争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第二,帮助农户培育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即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现实中大多数参与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农户社会网络单一,社会资本薄弱,生产发展能力有限,因此要尽快采取措施帮助农户培育各类社会资本,增强其内生动力。尤其要关注低收入农户这一群体,目前一些地区存在机械式执行扶贫政策的现象^[22],忽视农户内生动力的培育,结果反而“越扶越穷”。因此地方政府和资金互助合作社要注重培育农户社会资本,利用合作社这个平台将各种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联系起来,构建广泛的社交网络,增强入社成员之间的互动能力,最终实现低收入农户脱贫致富、其他农户收入增长的良好局面。

第三,完善低收入农户增收机制。政府以及资金互助合作社应当积极响应国家扶贫倡导,建立和完善农户增收机制,帮助和扶持低收入农户尽快脱贫致富。贫困户和低收入农户加入资金互助合作社需缴纳的基准互助金,可由投入到村的财政扶贫资金来承担。在资金使用方面,要优先满足入社的贫困户和低收入农户的借款需求,帮助他们发展农业生产,拓宽创业渠道,增强致富能力。另外低收入农户内生动力一般都低于高收入农户,因此在施行各类农村公共政策时要适当向低收入农户倾斜,例如给低收入农户比重较多的资金互助合作社以一定的专业技术和人才支持,助力低收入农户尽快实现增收。

第四,优化农村社会信用环境。建立和完善入社农户以及资金互助合作社的信用档案,开发标准化的信用评级系统,建立资金互助合作社内部、合作社之间、农户之间的监督和奖惩机制,促进良好的信贷支持循环,充分发挥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优势,加强入社农户资金流通能力,尽力解决农户贷款难的问题,早日实现农户增收致富。

本文的样本主要来自南京市开展资金互助合作的部分乡镇(街道),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另外内生动力的测度以入社农户在风险偏好、认知程度、抱负水平三方面的自我评价为依据,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未来的研究将继续扩大样本区域范围,尤其是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背景下,应当增加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调研,从内生动力视角论证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农户扶贫效应。同时,理论上需要进一步探讨综合评价农户内生动力的具体内容和指标体系,以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程度。

参考文献:

- [1] 罗荷花,李明贤.农村资金互助社试点中的问题及对策[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40-42+65.
- [2] 张德元,张亚军.关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思考与分析[J].经济学家,2008(1):40-47.
- [3] 潘军昌,曹超,滕佳悦.农民资金互助社资产规模与经营绩效关系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17(12):73-79.
- [4] 林乐芬,赵倩,沈建芬.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绩效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8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调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50-59.
- [5] 卢敏,李云方.B农民资金互助社的成因、运行与发展困境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2(3):38-42.
- [6] 张笑寒,汤晓倩,陆信娟.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融资能力评价——以南京市为例[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7):46-53.
- [7] 张林,冉光和.加入农村资金互助会可以提高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吗?——基于四川7个贫困县的调查[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2):70-76.
- [8] 孙同全.从制度变迁的多重逻辑看农民资金互助监管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农村经济,2018(4):41-53.
- [9] 朱乾宇,罗兴,马九杰.组织成本、专有性资源与农村资金互助社发起人控制[J].中国农村经济,2015(12):49-62.
- [10] 杨智玲,鞠荣华,杨沛华.农民资金互助社的自律行为与监管选择[J].农村经济,2018(1):69-75.
- [11] 赵锦春,包宗顺.互助金规模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稳健运行——基于股权结构的面板门限回归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5(12):16-31.
- [12] 黄平.严控风险增强服务的可持续性——福建省连城县旺万家养殖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资金互助助农增收[J].中国合作经济,2017(10):48-49.
- [13] 王慧芸,王刚贞.资金互助与精准扶贫耦合协调研究——基于临沂的调研数据[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5-51.
- [14] 吴忠,曹洪民,林万龙.扶贫互助资金仪陇模式与新时期农村反贫困[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 [15] 徐志明.贫困农户内生动力不足与扶贫政策绩效——基于江苏省342个贫困农户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2013(1):63-65.
- [16] 管睿,王文略,余劲.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内生动力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30-139.
- [17] 傅安国,张再生,郑剑虹,岳童,林肇宏,吴娜,黄希庭.脱贫内生动力机制的质性探究[J].心理学报,2020(1):66-81.
- [18] 陈其进.风险偏好对个体收入的影响——来自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证据[J].南方经济,2015(8):92-106.
- [19] 胡联.贫困村互助资金存在精英俘获吗——基于5省30个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村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家,2015(9):78-85.
- [20] 何军.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J].中国农村经济,2011(6):15-25.
- [21] Koenker R, Bassett G. Regression quantiles[J]. Econometrica, 1978, 46(1):33-50.
- [22] 姚松.教育精准扶贫中的政策阻滞问题及其治理策略[J].中国教育学报,2018(4):36-41.

[责任编辑:杨志辉]

Income Effect of Farmers' Mutual Funds Coope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dogenous Power

ZHANG Xiaohan, CHEN Yuwen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s' mutual funds cooperative has solved many external difficulties for farmers, bu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fficulty of overall income increase, some farmers' endogenous dilemma of low enthusiasm for participation has gradually presented itself. Based on the endogenous power perspective, this paper uses the micro-investigation data of 262 farmers in mutual funds cooperatives in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to construct quantile regression and OLS regression models to verify the effect of mutual funds cooperatives on the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endogenous power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household income of farmers who join the society, and that the income increase effect of high-income farmer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low-income farmers. Proportion of household labor force, value of productive fixed assets, social status and ease of loan also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income of farmers entering the society. Therefore, we should actively cultivate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farmers, give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farmers themselves, help cultivate social capital, improve the income-increasing mechanism of low-income farmers, optimize the rural social credit environment, and then build a comprehensive farm income increase mechanism.

Key Words: farmers' mutual funds cooperative; endogenous power; income effect;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farmers' income; rural finance